

<<经学历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经学历史>>

13位ISBN编号：9787101036152

10位ISBN编号：7101036155

出版时间：2004-07-01

出版时间：中华书局

作者：皮锡瑞

页数：267

译者：周予同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经学历史>>

前言

经学的三大派 皮锡瑞《经学历史》是经学入门书籍，可以说是“经学之导言”；本篇的任务，在介绍《经学历史》于读者之前，那不过是“经学导言之导言”而已。然而因为是经学导言之导言，所以不能不对于经学先作鸟瞰的说明，以便显出经学史的重要性和本书的价值。

中国经学，假使我们慎重点说，上追到西汉初年为止，也已经有二千一百多年的历史。这二千多年中，经部书籍，因为传统的因袭的思想关系，只就量说，也可以配得说“汗牛充栋”。

<<经学历史>>

内容概要

《经学历史》是皮锡瑞较有影响的经学著作之一，也是中国的第一部经学史专著。

《经学历史》刊刻于1907年，1928年经周予同先生的点校，商务印书馆作为国学基本丛书出版了《经学历史》。

此后，该书一直被当作经学研究的重要参考书目。

但学界对于该书在编纂方面的优劣，诸如编纂体例、史料运用的得失以及影响少有分析。

以下，本文力图在这一方面作一勾勒，以尝试对《经学历史》研究的另一个侧面略加探讨。

（一）作为中国的第一部经学史，《经学历史》的最主要特点首先是它的会通性，这里的“通”，包括时间跨度、内容的广度，同时也指皮氏写作思想的一致性。

众所周知，经学在传统社会中始终占据着意识形态的中枢地位，因此，在传统社会中经学一直受到各阶层的重视。

《史记》中首列《儒林传》，开创了以人物为中心的传记体经学史；班固《汉书》，增设《艺文志》而开书志体经学史的先河，以后经学史一直是正史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与此同时，私家著史也重视经学史的梳理，如唐初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中注重辩明经籍的源流，南宋郑樵《通志·二十略》中的《经籍考》在考订经籍的同时，更侧重于经籍的流变。

明代中后期，朱睦㮮作《授经图》将图、传、记集于一身，实际是清初朱彝尊《经义考》的先声，都是以书志体为主的经学通史。

成书于乾隆年间的《四库提要·经部》也是在时代学风影响下对经学的总结。

然而，皮锡瑞以前的历代学者，他们对经学的论述都还称不上一部“经学史”，他们也没有用“经学历史”冠名其著述的明确意识。

皮锡瑞有前辈先贤为他所作的积累与铺垫，有对两千年经学发展进行总结性论述的自觉；更由于1905年废除科举，经学“死亡”，需要对经学历史作一番探究原委的梳理，因此，皮氏在继承传统经学研究的基础上，把经学在传统社会的历史作了一番成系统能的整理与介绍，在《经学历史》一书中，皮氏从孔子删定六经述起，以儒家经典在春秋时期的流传为上限，而以清代今文经学的兴起为终结，对前经学时期以及经学独尊以后的各个阶段都有涉及，与经学发展始终的轨迹基本吻合，反映了经学从始到终的全部历程，既是对传统经学史的发展，又是经学发展的一个全过程的总结。

因此，从时间跨度来讲，《经学历史》一书是第一部完整的中国经学史。

从《经学历史》一书的具体内容来看，它汲取了史学中会通的特点。

如前所言，传统的经学史主要以传记体和书志体为主，其中传记体的经学史以人物为纲，因人立传，重在考察人物的经学学术宗旨与学术传承；书志体经学史以典籍为纲，因典籍分类立志，附以记或后记，而以记录典章制度为主连同选举、学校的典志体也间出其中。

上述三种经学史体尽管从不同侧面反应了经学的发展，但总是给读者一种“片面”而非“整体”的感觉。

而《经学历史》在论述每一时期的经学发展时，首述该时期经学发展的大势，并将该时期的制度（包括选举、学校）、重要经学家、每一经典在这一时期的训释大略以及这一时期经学的新特点一一列举，这样，既能把握经学发展的大势，又能对经学发展的个别环节有一“个案”的了解，扩大了传统经学史的涵盖面，给人一种高度概括的总体感观。

传统经学史以传记体和书志体为主，但是，传记体重在纪“人”，主要记录某一时期学者的经学思想和经学活动；书志体重在志“书”，记录典籍的传衍以及变化，尽管撰著者在编写过程中不乏主题思想，但“记注欲其方以智，撰述欲其圆而神”，从经学的角度来说，传记体和书志体的史料保存价值往往大于史学价值，缺乏通识别裁能力，使得经学史成了一种史料的堆砌给人以一种汗漫无归的感觉。

《经学历史》较好地弥补了传记、书志二体之缺。

在该书中，皮氏以今文经学作为经学的正宗源头，在对经学发展各时期的叙述中一以今文经学的发展为依归而判别之。

在书中第一部分，皮氏上溯经学源头，认定“经学开辟时代断自孔子删定六经之时”，认为孔子删削

<<经学历史>>

上古三代文献并在其中渗透了自己的微言大义，从而形成了经学。

经学形成之后，在战国时期流传于孔门弟子，但当时已经出现了经史之别：经学以孔子删削的六经为底本，其学要在讲求微言大义；而史学是以未经孔子删削的上古三代文献为底本，其学重史实之考求。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被确立为官方思想，但是武、宣之际，王霸杂用，所以此时皮氏定为经学昌明时期。

西汉元、成之后，经学成为主流学术并与政治活动相结合，直至东汉末，期间一直是今文经学独处庙堂，因此皮氏定此期为经学极盛时期。

汉末郑玄遍注群经，杂用今古，混乱了今古文家法，使得本来不解经的古文学派的经解也经“学”系统，后又加魏王肃的推衍，使得今文家法更无从找寻，所以皮氏定魏晋时期为经学中衰时期。

东晋、南北朝期间，战争频繁，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受民族文化融合大潮流的推动，他们在吸收汉文化时以继承为主，古文经学逐渐成为经学的主流；南方，在玄学的影响下出现了玄化的趋势，经学走向了多元化。

南北学风不尽相同，皮氏把该时期定为经学分立时期。

唐代统一南北后，为了加强思想控制，太宗令孔颖达主持撰修《五经正义》，对南北朝以来的义疏进行了整合，从而结束了魏晋以来的经学多元化局面，此为经学统一时期。

宋学在继中唐疑古惑经的学风中兴起，宋学中派别众多，但真正对后代经学发展有影响的是“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的道学——即理学，理学家在解经过程中贯彻依经明理依经明道的路径，“不信传注，驯至疑经，疑经不已，驯至改经、删经以就己说”别出心裁以构筑自己的理论体系，脱离了汉唐注疏之学，是故皮氏定两宋时期为经学变古时期。

元明之际，由于理学的进一步的发展演变，特别是心学兴起后，义理之学大盛，这便导致解经时新义叠出，这与皮氏的“经学宜述古而不宜标新”的立场相悖，皮氏斥这一时期为经学的极衰时期。

清代考据大兴，皮氏认为清学是在力图恢复汉代的经学，特别是“乾隆以后，汉学大明，嘉道以后，又由许郑之学导源而上，汉十四博士今文说至今日复明”，因此，清学是经学复盛时期。

由于皮氏今文家的学术立场，他的划分尺度并不一定正确，但是皮氏以今文经学为正统，按照今文为宗，古文尽管不解经，但去古未远，基本没有脱离经学的原意，宋学变古，尽弃古人旧说，故经学转衰的逻辑，将整个经学的发展脉络用一条清晰的线索梳理出来，最终把经学史贯穿为一个前后不可分割的整体，比较容易看出经学史的发展演变，这与传统的纪传体和书志体经学史那种见木不见林，支离破碎的现象相比是一种尝试，也是一种突破。

皮氏在《经学历史》中，用自己的观点对经学发展的各个时期作了一个连贯的叙述，使得我们能较为容易把握经学的演变。

在叙述经学变化的过程中，皮氏注意对各时期经学现象的成因进行分析，如在分析两汉今文经学衰落的原因时，首先从今文经学自身的原因出发，认为今文经学在东汉时，章句之学越来越繁琐，不能适合时代的需要；加之受到古文经学的打击，从而走向衰落。

这种注重对学术演变前因后果的分析，对于后人理解经学蜕变的原因具有一定的启发性。

《经学历史》一书的另一个较为明显的特点还表现在该书的编纂体例上。

《经学历史》在述论经学发展的过程时，将经学史划分为十个时期。

每个时期的标目实际上也就是该时段的特点。

在讲述每一时段的经学发展时，皮氏从制度、经籍、人物等几个方面展开论述，皮氏中间还插有皮氏之评论，夹叙夹议，“史”“论”结合，这种撰述方法既注意到了经学发展过程中“面”上的表现，又注重“整体”与“局部”的统一，即面上的展开均与该时期的特点相一致，每一分段的论述又为皮氏经学观——今文经学为正宗这一总论点服务。

这种体例有利于从横向——经学发展的面上的表现和纵向——经学发展的总体趋向把握经学，使得在叙述经学史时，既能了解经学在各个时期发展的大势，又能把握这一时段经学在经学史总体中所处的位置，以及这一时期上一时期前后的联系与得失，集叙述议论于一体，做到了以史证论而又论从史出，这实际上是借鉴了章节体的特点。

我们知道，章节体主要特点是以章节为纲，按题分章立节。

<<经学历史>>

不同章节的编排有助于加深对问题的研究，有较大的包容性。

《经学历史》一书，不能算是纯粹意义上的章节体，因为其中没有“章节”名称，但皮氏所列标题一目了然，概括大要，实具有章节的意义。

章节体体例源于西方，近代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学术也走上了近代化的历程。

《经学历史》在继承中国传统经学史的基础上，借鉴了西方史学的编纂体例之长，对学术史、经学史的研究走在向近代化的历程中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二）作为第一部完整意义上的中国经学史，《经学历史》有其优点，但由于受作者学术立场的限制和时代的局限，其中也存在着许多的问题甚至是错误，具体表现为：该书对经学史上各阶段的重要经学人物的评价有失偏颇；对于经学史上某些重要流派甚至避而不谈。

皮氏站在今文经学家的立场，对于经学史上重要的解经流派——古文经学和宋学都持否定态度，他认为古文经学是史学；宋学经解不符合圣人之意。

然而，宋学运动实际上是一场孟子的升格运动，理学在发展传统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同时，更偏重于内圣之学，最终使得《四书》之学超越于《五经》之上，修齐治平之道成了社会各阶层崇奉勿替的价值准则，从而对传统社会中后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理学家在继承魏晋玄学宇宙本体论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精致的形上思辨，使得传统儒学更加理论化。

这对于强化中华民族的逻辑思辨能力，拓展传统儒学的学术内涵都具有了无可替代的积极意义。

因而是中国传统儒学的重要发展阶段。

而《经学历史》仅以“空谈义理则无用”而否定之，不免显示出浓厚的功利化色彩，故评价也就武断。

但值得注意的是，皮氏在否定宋儒义理解经时，对于朱熹一派缺多有提及并曲意回护，如提到理学家删削经文以就已意时，皮氏认为此种学风与朱熹无关而肇端于二程兄弟，谓二程兄弟从义理出发断定章句的“真伪”，而朱熹则是按照理学的义理补写并加以发挥而形成现在的《大学》通行本。

其实，朱熹强分《大学》“经”、“传”，学界早有此说，皮氏明知而不置一喙，显失公允。

我们知道，朱熹治学重“格物”、“致知”，在学风上表现为朱熹重名物、典制的考据，是故章学诚认为朱学为清代学术的思想源头。

我们看清代今文家如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因其人受乾嘉考据学风浸染较深，故均对朱熹极有好感而崇奉之。

此种选择，与后期的魏源、康有为的是陆王而非程朱而大不相同。

如前所述，皮锡瑞治学踵凌曙、陈立、王闿运一派而来，其学风亦属实学一路，也因此皮氏要曲意回护朱熹。

正是站在这一立场上，皮氏对于理学中的重要流派——陆王心学，没有专门进行评说。

这不是简单的忽略，而是和皮氏的家派门户之见有关。

皮氏从通经致用的角度出发评价经学流派，但皮氏又受考据学风的浸染，从今古文方面来看，他尊今抑古；在汉宋观上，皮氏褒汉而贬宋，他一直坚持清儒反形上思辨的传统，认为其性理之谈近于老释之学，而在朱学与陆王心学的评判上，朱熹学风扎实，实为清儒考据学风的不祧之祖。

皮氏重考据，与朱学之实证学风存在暗合的一面，是故《经学历史》多曲护朱熹，而对陆王心学只用“糟粕六经”一语带过，更不要说对其进行客观的分析了。

皮氏对于经学史上重要的人物的评价也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在皮氏看来，凡治古文经者，在政治上均有大逆不道之倾向，如他认为刘歆治古文是为了助莽篡汉，又谓王肃、杜预之倡古文、注《左传》是为了助司马氏篡魏。

刘歆之助莽与他治古文经了无干系，这一点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已有明辨，至于说王肃、杜预之治古文，与司马氏之篡魏有关，于史无征，这更属皮氏的主观臆断。

查《魏书》王肃列传，称：“王肃亮直多闻，能析薪哉！”

刘寔以为肃方于事上而好下佞己，此一反也。

性嗜荣贵而不求苟合，此二反也。

吝惜财物而治身不秽，此三反也。

<<经学历史>>

”根本找不到王肃助司马篡魏的影子，至于杜预，他本着古文经学的立场，从前人对《左传》的注释中找出符合《春秋》的解说作《春秋左传集解》，今人刘家驹先生已有详论，可供参考。

查找《晋书·杜预传》也根本找不到杜预帮助司马氏篡魏的痕迹。

《经学历史》将经学的发展分为十期。

从皮氏的分期来看，经学的发展从两汉以后就在走向衰落。

皮氏重“今”轻“古”，扬“汉”抑“宋”。

他认为古文经学之兴起是对经学的第一次破坏；宋学之兴又是对汉学的破坏，因此，皮氏对古文经学与宋学评价极低，他的经学历史即是以古文经学对今文经学的破坏以及宋学对汉学的破坏为基础建立起来的。

但是自西汉末古文经学兴起后，重典制考证、音韵训诂，实为经学“向前”发展而非“衰落”的一个新阶段，由许慎、郑玄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家，开启了下至于隋唐的一代新学风；至于理学，杂采佛老入儒，将儒学的纲常名教作“形上”安顿，将传统儒学理论化、“哲理化”，这更应当视为经学的发展而不是衰落。

在理学发展的过程中，朱熹一派由“格物”而“致知”的治学路线，胎育出严谨扎实的治学风格，这不仅是东汉经学学风的回应，更是清儒考据学风的源头。

朱学与清儒之渊源，章学诚《文史通义·朱陆》所言甚详，惜乎皮氏对此均视而不见，他站在“今文”（西）“汉学”的立场上抑古文、反宋学，以己意而衡经学之衰落，皮氏的这种分期法归根结底是为了凸显清代今文经学的“复兴之功”。

皮氏以“有用则盛，无用则衰”视经学，全然将经学作为政治的工具来看待。

他认为今文经学的衰落是由于章句之学的发展使得后期今文经师背离了先师的师法，偏离了为现实政治服务这一目标而走向衰落。

殊不知，两汉今文经学的衰落恰恰是因为今文经学与政治之间未能保持一定的张力，和现实政治“贴”得太近所致，今文经学的讖纬神学化是它衰落的重要原因，皮氏站在“今文”（西）“汉学”立场上的经学分期法，家派色彩太浓，主观性太强，未能真正揭示经学历史发展的实质。

（三）《经学历史》成书于1905年，1907年由长沙思贤书局刊刻，从此，该书迅速流传，1928年，商务印书馆作为国学基本丛书出版，对于近代以来的政治、学术研究起过重大的影响。

在政治上，皮氏反对革命而力主清政府推行新政，《经学历史》一书正是皮氏这种政治立场的产物。

1905 - - 1907年，章太炎正以古文经学为武器，大倡排满革命，与当时宣传保皇的康有为进行论战。

章氏见到《经学历史》后立刻明白了皮氏政治含义，是故章氏将皮氏视为康有为之同道，而对其《经学历史》痛加批驳，1907年章太炎作《驳皮锡瑞三书》，谓《经学历史》“钞书原委，故妄以己意裁断，疑《易》《礼》皆孔子所为，愚诬滋甚”，为“牧竖所不足道”，“然而，章太炎仍纠缠于孔子喜《易》制《礼》的古老争论上，并不能否定皮氏”，并没有辨明《易》与《春秋》是否是经学之重镇，也即清代今文家的理论到底能否成立。

但是，章氏为革命派领袖，学界泰斗，他能够注意到《经学历史》，从一个侧面反应了《经学历史》一书在当时的影响。

《经学历史》成书的同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经学至此退出政治舞台，这使得《经学历史》对于经学史的叙述成了经学寿终正寝的挽歌。

在经学由中心走向边缘化的过程中，对经学史的研究逐渐走向学术化的道路，《经学历史》对此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1907年《经学历史》刊行后，同年刘师培作《经学历史教科书》，刘氏将经学历史的发展分为四期，其所重在经学典籍的传衍，刘氏身为古文家，他的经学立场与皮锡瑞大异其趣，书中多次强调了古文典籍之可信，显然系针对《经学历史》及《经学通论》而发，以纠皮氏之偏颇。

这种论辩实际上推动了经学史研究的发展。

1927年，日本人本田成之的作《支那经学史论》，本氏将中国经学发展分为七个时期，显然受到《经学历史》的启迪。

本氏述先秦述儒学典籍的流传完全取法《经学历史》；其有关两汉今文经师的“师法”与“家法”之

<<经学历史>>

说也全由皮氏之论脱胎而来。

1936年，马宗霍作《中国经学史》，马氏在自序明谓：“晚世有皮锡瑞的《经学历史》，始自具裁断”，肯定了皮氏在经学史研究的首创之功，但认为皮书“与但事抄书者稍殊，持论既偏，取材复隘”

。马氏之书实是对皮氏之书得纠偏，但在分期（马氏分为十二期，按朝代裁断）上下限于皮氏分法大同小异，在内容上，也借鉴了皮氏的会通思想，体例上，马氏在书中史论结合，在章节体已走向普及的时期（马氏书成于1936年），仍然与皮氏之书的形式无大改动，足见皮氏是在纠正皮氏，同时也看出其受皮氏影响之深。

马书于皮氏之书相比，无论从观点上、材料上都比皮书客观充分，但与皮氏之书的关系来看，不能不想到皮书对经学史研究的推动作用。

<<经学历史>>

作者简介

皮锡瑞(1850-1908)清末学者。

湖南善化(今长沙市)人。

字鹿门，一字麓云。

举人出身。

三应礼部试未中，遂潜心讲学著书。

他景仰西汉伏胜之治《尚书》，署所居名“师伏堂”，学者因称之“师伏先生”。

1890年(光绪十六年)主湖南桂阳州(今桂阳县)、龙潭(今淑浦县)书院讲席。

后二年移江西南昌经训书院，说经严守家法，词章必宗家数。

中日甲午战争后，愤于《马关条约》的丧权辱国，极言变法不可缓。

1898年春，任“南学会”会长，主讲学术。

开讲三月，讲演十二次，所言皆贯穿汉、宋，溶合中西；宣扬保种保教纵论变法图强，听者无不动容。

其讲义及答问均刊于《湘报》上，被顽固派斥之为“邪说煽惑”。

当顽固派诋毁“南学会”时，他不避艰险，往复辩论，表现了救亡图存的热情。

“戊戌变法”后，清政府指责他“离经叛道，于康有为之说心悦诚服，若令流毒江西湖南两省，必致贻害无穷”，并下令革去其举人身份，逐回原籍，交地方官严加管制。

晚年长期任教，并任长沙定王台图书馆纂修。

博览群书，创通大义，今文经学造诣很深。

所著《五经通论》，皆为其心得，示学人以途径。

《经学历史》则是经学入门书。

他主张解经当实事求是，不应党同妒真，对各家持论公允为晚清经学大家之一，工于诗及骈文。

著有《师伏堂丛书》、《师伏堂笔记》、《师伏堂日记》等。

<<经学历史>>

书籍目录

序言凡例 一 经学开辟时代 二 经学流传时代 三 经学昌明时代 四 经学极盛朝代 五 经学中衰朝代 六 经学分立时代 七 经学统一时代 八 经学变古时代 九 经学积衰时代 十 经学复盛时代附录一 皮鹿门先生传略附录二 本书引用清代人名出处表重印后记

<<经学历史>>

章节摘录

注：“《续汉志》曰：……其日，乘舆先到辟雍。

礼毕，殿坐于东厢，遣使者安车迎三老五更。

天子迎于门屏，交拜，导自阼阶。

三老自宾阶升东面，三公设几杖，九卿正履，天子亲袒割俎，执酱而馈，执爵而酹。

五更南面，三公进供，礼亦如之。

明日皆诣阙谢，以其于己礼大隆也。

”按明帝以李躬为三老，桓荣为五更。

搯绅，言插笏带间也。

古之仕者，垂绅插笏，故引申以为宦族。

或作缙绅，假借字。

《后汉书·儒林传》注：“《汉官仪》曰：辟雍四门外有水，以节观者。

门外皆有桥。

观者水外，故云圜桥门也。

圜，绕也。

”四姓指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也。

《后汉书》卷二《明帝纪》永平九年：“为四姓小侯开立学校，置五经师。

”注：“袁宏《汉纪》曰：永平中，崇尚儒术，……为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诸子弟立学，号

四姓小侯，置五经师。

以非列侯，故曰小侯。

”期门，官名。

汉置期门郎，以仆射领之，掌游猎。

汉武帝好微行，诏陇西、北地良家子能射者期诸殿门，故有期门之号。

后汉改期门仆射为冗从仆射。

羽林，禁卫之称。

汉武帝置建章营骑，后更名羽林。

宣帝使中郎将骑都尉监之，领郎百人，谓之羽林郎，取从军死事之子孙养之。

永平，汉明帝年号。

明帝在位18年，当公元58年至75年。

班固《两都赋》：“至于永平之际，重熙而累洽。

”按言其昇平也。

《后汉书》卷百零九《儒林传》序：“自安帝览政，薄于艺文，博士倚席不讲。

”注：“倚席言不施讲坐也。

”《后汉书·儒林传》序：“顺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黉宇，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

试明经下第，补弟子。

增甲乙之科，员各十人。

除郡国耆儒，皆补郎舍人。

”注：“《说文》：‘黉，学也。

’黉与横同。

”《后汉书·儒林传》序：“本初元年，梁太后诏曰：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

每岁辄于乡射，月一飧会之。

以此为常。

”语见《后汉书·儒林传》序。

《后汉书》，范曄撰。

曄字蔚宗，刘宋南阳人。

<<经学历史>>

博涉经史，善属文，能隶书，晓音律。

累迁太子左卫将军。

后以谋逆罪伏诛。

传见《宋书》卷六十九及《南史》卷三十三《范泰传》。

<<经学历史>>

编辑推荐

是研究经学的重要入门书，对研究古代文学、历史、哲学等，也有极大的参考价值。中国经学起自西汉初年，绵延二千多年，各种著作，汗牛充栋，然而却缺乏严整、系统的经学通史。清未经今文学家皮锡瑞所著的《经学历史》因此显得格外珍贵。此书对经学及其历史作了简要、清楚的介绍与评价，内容涉及经学史中的重要典籍、各种流派和代表人物。现代经学史家周予同先生又为此书作了详细、精当的注释，举凡典籍、人物、典章制度、生词僻义，均一一引征文献、详加阐发，为原书增色不少。

<<经学历史>>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